

“江南农事”:基于时间社会学视角的历史考察

——读《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

朱振华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6-0137-06

关于时间本体及其属性、结构、功能的讨论,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物理学、天文学、哲学等学科范畴的命题。但在根本意义上,时间与人类的生命意识息息相关,它的存在价值系于主体生活世界的社会建构,因此时间与记忆问题始终也是史学研究的母题。有研究指出,迟至民国时期,受新传入的西方哲学理论影响,国内学者才一改不重视“时间”本体讨论的习惯,在自觉接受和运用大量源自西方的时间概念、范畴的基础上,展开诸多关于时间问题的追问和讨论。“这一转变构成了中国哲学和学术现代转型的一个颇具典型意味的切面”^①。20世纪50年代前后,伴随着社会时间的研究,西方学界逐步产生了“时间社会学”理论流派,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获得了长足发展^②。相对国外人文社科领域关于时间与记忆问题的研究热潮,国内学界对“时间”问题的研究虽引起了关注,并从以综述性、概括性、介绍性研究为主开始转向自主创新研究,但相关问题意识和研究成果还远远不足。例如,在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到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之中,传统时间制度遭遇了怎样的冲击?面对现代性问题,民众及其时间制度与文化惯性作何反应?历史学者寻绎“时间观”问题,是否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及其运行机制?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学界仍嫌缺乏精到有力的揭橥、分析和考察。有基于此,王加华在充分吸收“时间社会学”前期成果的基础上,以传统社会江南地区的农事节律和民众的生活叙事为着眼点,跳脱“传统-近代”模式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将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向学界呈献的这本《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就成为了回应上述关切的一部具有借鉴价值和比较意义的作品。

一、“时间社会学”的解释框架

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逐渐加强,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如果说,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求人类演进之通则,明吾民独造之真际”^③,那么在现代性与本土化的双重驱动下,从宏大叙事转向“民众”及其社会生活研究,努力使普罗大众成为历史研究的中

【收稿日期】2020-01-28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基金青年学者重点培养计划研究专项“乡村自治能力现代化与实践创新机制研究”(18CQXJ09);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风近邹鲁:齐鲁礼仪之邦的当代价值与引领路径研究”(19BCJ75)

【作者简介】朱振华(1985-),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方向博士后,齐鲁师范学院乡村调查与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转型与民俗传统。

① 湛晓白:《民国学术界关于“时间”的哲学认知》,《兰州学刊》2018年10期。

② 参见景天魁:《时空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英]约翰·哈萨德主编:《时间社会学》,朱红文、李捷译,2009年;吴国璋:《西方社会学对社会时间的研究》,《学术界》1996年第2期。

③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1页。

心和主体,这无疑是当代史学发展最引人瞩目的潮流。问题在于,历史学注重对“过去”的研究,社会学强调对“当下”的考察,这种学科分际造成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面对“农事节律”“生活叙事”等问题时自说自话的现象。时间社会学的研究理念则认为,时间与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时间的根本性质即在于社会建构。换言之,由于社会时间被社会所建构并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连,因此农民的生活实践与农事节律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结构性、依附性的关系。所以,只要将“时间中的事件”(历史学)和“事件中的时间”(社会学)以一种动态的、结构性的眼光结合起来,就足以揭示农事节律之于民众生活的社会建构过程及其社会文化意义。诚如有学者就“社会学的想象力”问题所剖解的那样,“社会学想象力涉及三个维度,即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历史(history)以及个人生活历程(biography)。社会结构的维度关注的是特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形态,结构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如何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结构,结构的持续和变化意味着什么。历史的维度关注的是特定社会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变迁的动力,对于整体人性发展的意义,历史时期的由来和影响,形塑历史的特定方式为何等”^①。

王加华近年在对“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及相关问题的持续研究中深刻认识到,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中国,“乡土中国”的性质与特点实际上统摄在“农事节律”这张时间的大网之下。透过时间制度与生活实践的结构性变迁,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局势,而且也可以看到一个较长时段中农事节律演变的内部张力。令人遗憾的是,既有的面向中国社会的时间研究,要么是对民众时间生活与时间观念做一种“描述式”“变迁式”的线性描述;要么是以“民俗节日”等非常时段的社会事件做静态记述;要么是从“冲击-回应”的解释框架出发孤立地看待国家政策与民众的应激反应等。王加华认为,由农事活动构成的“社会时间”,与那种可以衡量长度的、表现为物理学意义上某种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和顺序性标记不同,它主要由乡民们应自然衍变所生成的农事节律,以及地域色彩富丽的各类仪式活动和劳作模式组成。因此,农事节律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乡村民众是如何依据农事节律来组织年度日常生活并保持了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以及这种结构性安排又是如何影响了传统中国民众时间观念与整体社会文化”^②。他进一步指出,所谓的“时间结构”主要包涵三个层面的意蕴:类型结构,即构成传统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的内容、比例;主体结构,即与不同规模民众主体相联系的时间类别在整个社会生活时间中所占的比重及其组合方式;以及计时单位与计时体系的结构性安排等。在王加华看来,时间与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正是由于人的主体意义才使得原本抽象的时间具有了十分生动、丰富多彩的“质”的意义。因此社会时间结构,无论是其功能划分还是主体分层与计时体系安排,从根本上而言都是人为塑造的结果。或者说,这种时间结构也就是一种“被人为结构”的结构,与之相关联的社会时间也就是“被结构的时间”。在不同社会制度或经济体制下,日常生活时间之所以有千差万别,与这种被人为附加的结构性时间制度有直接关系。

具体说来,就农事活动与乡村生活之间的关系而言。作者发现:无论是农民的副业生产、商品交易、农具购买、外出劳务、水利兴修、资金借贷等经济行为,还是节日庆祝、戏剧演出、游艺赌博、乡村集会、走亲访友、破土补垣等信仰娱乐与社会交往活动,甚至是盗匪骚乱、灾荒流离、反叛起义等极端性集体行动的爆发等。这些活动无不和农事节律有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契合关系。在农民那里,“时间”并非是一种不可捕捉的抽象概念,它与自身的生活实践紧密相连并被碎片化为纷繁复杂的具体活动和生活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这些零零散散的农事活动搭建的微观世界,构成了乡土社会宏观的社会组织与经济关系的基础。从这种时间社会学的视野出发,将“社会学的想象力”与富有历史感的农事时间安排统摄起来比较分析,农事节律就从杂乱无章的迷局中剥离出来,呈现出以个体时间为主,群体事件为辅的态势,同时又通过农事节律的“时间核”作用而在整个社会形成大体模式一致、充满循环性的总体时间节

① 成伯清:《时间、叙事与想象——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江海学刊》2015年第5期。

② 王加华:《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律,即文化时间节奏。王加华将这三种时间层次概括为“一种明显的分层与嵌入性结构关系,即群体时间嵌入个体时间、个体时间节律决定总体社会时间节律”^①。通观全书,作者正是抱持着这样一种研究理念,着眼时间生活的主体分层及其结构安排,注意到了国家政治、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之前的互动关系,进而搜集、比较、分析农民的生活事实。以此理解农事节律问题,不但具备了历史通观和社会洞察力并重的学术视野,而且在学理意义上超越了以往研究关于“时间”问题的静态描述方法,从而走进了社会时间和生活事件的内部,进而清晰地呈现出了近世以来社会生活层面各种文化交织现象背后的动因和理路。

二、时间、叙事和乡村研究

一般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时间观漠视精确,缺乏发达测度时间观念,以及循环时间观念根深蒂固、注重历史和过去,强调个体时间感觉等。兼之具体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民众很少具备记录和研究农事活动的能力,而具备能力的人又大多不愿或无意开展记录和研究,这就在客观上给面向农村、农民的时间研究造成了无从措手的困难。与此同时,生于乡土,终老乡土,这在漫长岁月总被绝大多数国人视若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社会事实,即便是“知识人”也缺乏研究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无论是古代知识精英‘采风问俗’的政治行为,现代史上知识分子‘向民间去’的社会运动,还是当代规模庞大的田野调查包括非遗普查活动,似乎都主要是在担当某种政治工具的角色,未能在对乡村社会的整体认知、学理建构和人文关怀等层面充分发挥效用”^②。体现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的乡村研究成果上,大致可表现为: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变化不敏感,乐于描绘非常时段的社会事件或奇风异俗;缺乏问题意识,习惯模式化归类的田野调查;沉湎于共时性的“深描”,回避或拙于提炼、总结民众生活世界长时段的结构变化等。

以“时间社会学”的研究理念和视角开展社会研究的要义恰恰在于,要将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相应地,二者之间贯通的关键就是要打破国家政治、社会变革、文化传统等宏大叙事和民众日常生活层面弥散化、微观化的生活叙事之间的阈限。从研究方法观察,王加华无疑意识到了这种取向的研究必然面临传统史料匮乏的问题。因此他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广泛采用了方志、古农书、近代报刊、调查资料乃至内容相关的小说、散文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传世史料、文化事实和文本书写之间,作者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动态的研究理念: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存续在特定的文化语境和社会情境之中,研究者只有将目光投向“主体”的生活实践当中去寻绎和观察,才能对中国社会之所以在几百上千年的起伏激荡过程中保持文化赓续、发展和变化的机制做出合理性的解释。由此,在案头工作之外,王加华还大量采用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作业方法,先后在松江、湖州、桐乡、嘉兴、金山等地进行了扎实细致的田野调查。从传统社会时期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作物种植制度的关系出发,作者仔细考察了农民在劳动力投入周期、家庭副业生产、经商、做工与捕鱼、农业生产资料准备、劳动力雇佣等经济生活,以及与吃、住、行,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等社会生活相关的农事节律的特点。对民俗生态的全景性再现和多点田野个案的聚焦分析,显示出作者在方法论上既有走向历史/社会的跨学科视野,又有突破个案限制,努力从不同地域社会发展的历史比较之中归总出系统认知的范式取向。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视野和跨学科、跨视域的技术路线,突破了区域社会史研究常见的宏观叙事倾向。以此为基点,《被结构的时间》便能游刃有余地对江南地区的农事节律与民众的生活体系给予分层描写和深度阐发,从而为学界探究时间的社会建构过程及其社

① 王加华:《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② 张士闪:《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会文化意义,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工作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何以能够跳出农史专著常见的琐碎、平淡、寡味的陷阱,在厚重耐读之外还获取了多方面的学术创见?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是作者清晰的问题意识赋予其案头研究以认识论的解析性张力,而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开放的理论视野则为其系统的学理性阐释提供了富有余味的广阔空间。从学科视域融合的理念出发,王加华意识到,人类实践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现象与社会事实都是时空关联的特定存在,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自然也会受到历史情境的时空限制。“在诸学科之中,历史学强调的是以时间为尺度的问题分析,空间更多只是在默默充当一个舞台的角色;地理学则更强调空间层面,时间更多只是分析问题的一个外生环境。历史地理学采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长,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既注重时间分析,亦注重空间探讨。但是,时间在历史地理学中更多还是被内涵于空间分析之中,且缺乏时空间的多样性与个性化探讨。相比之下,时间地理学在时空结合分析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①。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学科班出身的学者,作者这样敢于破除门户成见,立足学科优势互补的深层联系去发现问题、回答问题,这才能够以农事节律为轴心建立起“时间社会学”的关联性动态视野,从而揭示出了民众年度时间生活实践和乡土社会变迁之间若隐若现的时代轨辙。

另一方面,合理运用“讲故事”的叙事策略是作者在演绎理论和解析史料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有学者发现,“在新时期‘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语境下,学界开始反思中国社会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提出应通过把握‘叙事’来释放田野工作的想象力,挖掘细腻的中国故事,透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②。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都意识到,所有阶级和群体都拥有“叙事”的能力和权力,“讲故事”甚至应被视为生活本身。当然,历史写作本身自然也是一种叙事,只不过它的修辞主要由学术语汇构成。换言之,时间社会学研究的理想追求,应当也是通过文本叙事,将“时间”从事象归真到事件,再还原到生活主体的社会情境和意义世界之中。由此观之,《被结构的时间》无疑是一部懂得“讲故事”真谛的作品。以作者分析传统时期江南棉稻区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节奏的章节为例:王加华将晚清时期的上海县作为着眼点,从一首《田家月令》诗词起笔,辅以地方志、民间歌谣、日记、报纸等资料,条分缕析,进而豁然开朗地呈现了从地方传统到全景社会的世俗面相。在栩栩如生的历史叙事之外,一幅既藏有集体记忆和生产、劳作故事,又富有历史感和生活感的风俗图卷跃然纸上。

三、时间观:“理解中国”的新视角

平心而论,“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免不了会受两个基本问题的‘诱惑’:一是求‘真’,即探寻生活中真实的社会存在;二是求‘全’,生活的真实若不能说明社会全体的脉络和逻辑,自然就难说是‘社会’科学的”^③。在笔者看来,围绕区域社会展开农事节律问题的讨论,其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能为社会全体提供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可能性解释。因此,时间社会学视角的区域社会生活研究,就绝不能仅仅是社会生活的线性描述或记述,而是要从具有代表性的“农事活动”“生活事件”出发,发掘由民众生活实践所触发的社会运行机制。同时,在广度和深度上尽可能拓宽、延展和汇融与之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关联。以此为前提,方能依据史料线索澄清牵涉全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历时性关系和共时性联系,挑明社会运行的多线机制和文化逻辑,最终通过结构化的方式拨亮历史社会的整体图景。王加华显然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以农为本的时间生活模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时间观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时间观一旦形成又会对整体社会文化产生反向作用,发挥自身影响力。因此,以时间观为

① 王加华:《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8页。

② 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③ 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年第1期。

切入点,能为进一步理解传统中国文化的整体面相及其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①。

事实上,站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怎样理解中国乡村及其生活主体的行动逻辑,这是中国学术界近年一直关注、讨论的问题。作为深层结构形式,时间不是孤立个人意识和行为的产物,而是被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活动综合塑造的结果。因此,具体到时间社会学为取向的操作范式上,王氏专著立足于江南地区的棉稻、蚕桑区为中心的个案研究,王加华首先以传统节日及其时间谱系作为考察对象,剖析农民的农事活动、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生活叙事和整体性思维。在此基础上,作者重点分析以农为本的年度时间生活对传统中国民众时间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从国家、社会、民众等多元创生的角度,对近代以来中国本土时间观念在以“西俗东渐”为代表的现代性问题的冲击下造成的结构性变迁进行了探讨。所谓“时间观”,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们关于时间的认识、理解和建构。作为人类文明社会化的存在方式,一种时间观的形成,自然与特定的地理环境、劳作模式、生计习俗、文教传统等有直接关系。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modernity)作为现代人的心性及其结构,时间观念构成其基础性一环。伴随现代性人文主体性的对象化活动,现代时间观念成为从现代化制度行为(政治、经济)到现代日常生活,直至现代人自身人格气质最深层的建构条件之一”^②。因此处于不同社会文化系统的族群或组织,对时间的感知、理解与建构方式千差万别。换句话说,时间观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它不但令民众日用而不觉,而且会深刻影响并制约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与文化创造,从而广泛参与人类主体的生活实践与社会运作过程。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时间观具有“漠视精确、缺乏发达测度时间概念、以循环时间观为主、注重历史和过去以及个体时间观念至上”等特点。王加华认为,这一系列特点的形成,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及民众以农为本的年度时间生活节律态势具有直接关系。反过来,这种时间观又对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保证了中国社会长期稳定有序的发展,形塑了民众保守主义的社会心态,强化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基层社会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等等。及至清季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工业化浪潮的涌入,现代工业、新式交通、新式教育突飞猛进,传统乡村以农为本的时间体系全面遭逢工业时间、阳历体系、钟点计时等现代时间制度的渗透、冲击,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时间生活模式与时间观念开始发生初步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受集体化模式影响,虽然民众时间生活中的农事时间全面扩张,但这种反转主要是特殊历史时期的行政化安排,已经失去了传统社会时期民众忙闲节奏不违农时、顺乎自然的本意。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江南地区乡村工业的发展,工业时间日益取代农事时间成为民众年度生活的轴心,阴阳历法体系、钟点时间等实践体系广泛建立,“守时”“时间就是金钱”等观念深入人心。作者在上述步步深入的论证之中,除展现出了宽阔的学术视域和清晰的问题意识,还在谋篇布局之间体现出审慎严谨的逻辑结构。因此,就其区域社会研究所达到的文化深描与意义阐释而言,堪称是目前同类课题中鲜有的实证性研究的力作。

当然,在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本书关于区域社会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深描”同样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如果说江南农民的“年度时间生活”是一个个具体实在的文化体系,它们为特定的生活主体所持有和认同,且拥有各自的生成语境以及劳作模式、文化制度。那么,对此情境较为理想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就应当超越一个作为群像或族群的“农民群体”,而是能够通过具体落脚到个人生活史、口述历史等微观世界乃至私人领域的个体生活事件去活化地方社会的这幅“凝固的幻象”。毕竟,“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具有思想、行动的个体性和复杂性。因此在勾勒出农民群像的同时,只有从精英而大众,由群体到个别,才能进一步呈现个案研究的意义并说明个体和整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虽做了初步的探索尝试,但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离“新社会史”或“新文化史”同类研究

① 王加华:《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5页。

② 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

的代表性作品还有一定差距。

要言之,中国社会空间的广阔性以及人文地理的多样性、差异性,决定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及回答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可以说,从历史地理学到时间社会学,王加华跨越了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分际的界限,将中国史学传统与新史学理念相结合,采用跨学科、多视域、重叙事的研究策略,立足区域社会的田野研究,从空间出发,以时间为线,串联起了研究单元内部多重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从而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从研究“空间”到延展“时间”,从关注“时间中的事件”到兼顾“事件中的时间”的转变。惟有如此,以“农事节律”和“民众生活”为着眼点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才能“以小见大”地揭示中国社会时间制度的结构性衍变并揭橥它们得以产生和“再生产”的运作机制,从而最终超越“区域社会”的研究单元,真正做到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

(责任编辑:李良木)

《中国农史》征稿启事

一、来稿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缜密,材料翔实,行文简洁流畅。论文应有文献综述,且章节清晰,标题设置恰当。篇幅一般在12000字左右。

二、文稿内容应包括: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所在省份及城市、邮政编码,中文摘要(200~300字),关键词(3~6个),英文文题,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及单位,英文摘要(内容与中文摘要一致),英文关键词(与中文一致),正文,参考文献。引文务必查对准确,注明出处,注释一律为页下注。注明论文所受基金资助。附作者简介,写明性别、出生年份、学历(位)、职称、工作单位、代表论著及主要研究方向。

三、稿件一般在三个月内予以答复。超过三个月未收到处理意见者,作者可自行处理。因经费问题和人手所限,本刊恕不退稿,敬请作者自留底稿。

四、本刊已启用采编系统,投稿请登陆:<http://zgns.paperonce.org/>。

五、编辑部邮箱(zgns@njau.edu.cn)主要用于交流,不接收投稿。

六、本刊不收取包括审稿费、版面费等任何费用,请广大作者知悉。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卫岗1号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内

邮 编:210095

电 话:(025) 84396605